

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

●何艳玲¹ 周晓锋² 张鹏举¹

(1.中山大学 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2.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新加坡 119620)

摘要:多数对中国草根组织的研究都将“合作”视为草根组织处理与其他组织间关系的最佳行动策略。基于对一个草根组织的个案研究,发现:其一,“合作”并非总是草根组织与其它组织优先选择的行动策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与政府相关部门)“不合作”可能是边缘草根组织经常选择的策略。其二,面对不同类型的组织,草根组织可能采取四种性质不一样的行动策略:拒绝(不愿合作)、避免(不敢合作)、默许(可以合作)、欢迎(积极合作)。同时,提出了一个“依赖-信任-决策者”的分析框架,对草根组织行动策略进行了解释。

关键词:合作 边缘草根组织 行动策略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09)01-0048-07

1 研究动机

毋庸置疑,草根组织的发展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景观。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特殊体制下,关于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也随即成为讨论的热点。目前,对国内草根组织行动策略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朱建刚^[1]对上海热爱家园青年志愿者协会和广州市绿色希望义工网络做了长期调查,提出当前草根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法律、人力、资金、信任和知识五大困境。基于这些困境,草根组织内部逐渐形成了以下共识和规范,即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不涉及政治以及实现低成本操作等。赵秀梅^[2]考察了妇女维权组织、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在内的诸多非营利组织,揭示了在当前政治语境下,这些组织如何利用行政权威增强自身组织合法性以及如何利用自身领导人的私人关系来影响乃至介入政策议程和监督政府行为。辛甜^[3]基于对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个案研究,分析了该慈善组织在运营过程中,如何与政府、新闻媒体、捐款人和企业建立关系来拓展运作网络。她认为,该组织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就在于该组织有效地经营了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建立使得他们获得了足够的信息和资源。张紧跟等^[4]通过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

委员会的个案研究,认为草根组织采取的主要行动策略是非正式政治,即草根组织无法依托正式的规章制度和程序进行日常运作,不得不寻求非正式的渠道进行运作。

以上研究基本上都隐含着—个预设,即:与其他组织(尤其是政府)形成合作关系是草根组织重要且优先选择的行动策略。本文的研究则源自一个经验观察:在大量草根组织中,有一些组织从其组织规模来看,是草根组织中的“微型组织”;从其资源获得来看,是草根组织中的“弱势组织”。与大规模的、有正式体制庇护的草根组织比起来,这些组织的生存策略,也将呈现其特殊性。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这类组织统称为“边缘草根组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一个旨在为农民工(该组织称其为工友)提供服务的“边缘草根组织”为例,揭示这种行动策略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显现立足于对如下两个问题的回答:第一,与其它组织开展合作,是否真的是这类边缘草根组织选择的行动策略?第二,如果“合作”不是边缘草根组织选择的行动策略,那么为什么?

2 研究的个案

我们所观察的个案是G市工友服务中心(以下简称G市工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的大规模聚集,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劳动报酬达不到最低

收稿日期:2008-03-21

作者简介:何艳玲(1975-),女,湖南郴州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博士,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行政学理论与方法、地方治理与非营利组织发展。

工资标准、休息时间少、工作强度大,农民工权益维护问题逐步凸显^[5];另一方面,基于成本与技能的限制,农民工在权益受损后一般不会采取正当法律渠道来解决,权益损害更为严重。在此背景下,以维护农民工权益和促进农民工自身素质发展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开始创建并迅速增长。1998年,G市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简称G市打工族)成立,在很多人看来,这被看成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劳工自救的开始”^[6]。目前,珠三角地区为农民工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已经达到一定数量。与其它面向农民工(以下称工友)开展服务的草根组织类似,G市工友具有如下特征:

(1)民间性。G市工友由曾是工厂主的赵夏(现为G市工友总干事)创建于2005年1月,是一个典型的、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草根组织,其职能旨在为工友直接提供各类服务,包括:第一,工伤(职业病)工友探访。G市工友以G市8家提供手术外科诊治的医院作为重点探访对象,由专职干事、志愿者不定期到医院派发G市工友内部宣传资料和《劳工法律手册》《工伤维权》等维权宣传材料。第二,劳资冲突的法律指引和代理。主要是对投诉者进行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讲解,帮助工友收集证据,撰写文书,指导帮助工友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为需要的工友做出庭代理。第三,举办讲座与文化活动。定期举行“工友依法维权系列讲座”等讲座和宣传活动,并同高校等教育机构合作开展法律义诊、图片展览、社区服务等活动。这45场讲座主题分别是:人权与国际劳工标准、劳动合同、劳动者的权利、怎样告老板(劳动仲裁)、工伤了该怎么办、工伤保险的伤残鉴定与待遇、怎样辞工、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会是什么、怎样投诉老板(劳动投诉)等。G市工友还刊印了《劳工法律手册》10000册用于免费派发。第四,开展工厂调查。为了准确把握工友的工作和生活状况,G市工友针对工厂劳动法规的执行情况定期开展调查。调查的方式有两种:直接面向工友的问卷调查;安排专门调查员进驻目标工厂暗访。第五,志愿者工作。G市工友认为只有动员更多的人参与服务活动,使志愿工作成为社会性的活动,才能更加彰显活动的意义。为此,G市工友非常重视志愿者工作,并在2006年底策划过一项志愿者活动——动员并培训100名大学生志愿者一对一地帮助100名有维权需求的农民工。

(2)欠合法性。根据目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我国对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

由于各种原因,至今G市工友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业务主管部门,不能获得社会团体或者民办非企业组织的身份;考虑到运作成本的问题,G市工友也没有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在工商局登记。

(3)行动的高敏感性。基于以上两个原因,G市工友一般以不合法组织的身份活跃在为工友维权的“现场”,其行动往往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行动具有高敏感性。

(4)劝募困难。由于无法得到政府支持,G市工友只能通过其它各种途径获得民间资源和海外资源,但G市工友并无资格在社会中公开劝募;而且,一旦募捐规模过大,也容易落入非法集资等法律纠纷当中,组织劝募困难。

(5)结构简单。在《G市工友组织章程》第四章,对G市工友的组织结构有如下阐述:

组织的最高权力属于理事会。理事会通过民主选择产生,共有理事10名,其中2/5为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3/5为志愿者。理事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议程包括组织章程修改、制定并审批工作计划和任务,审议工作报告、财务报告,推举总干事。总干事负责组织日常工作,其中包括专职干事的聘用和解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可以就总干事的工作表现向理事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虽然章程做了详尽的规定,但是自成立2年多以来,G市工友组织发展一直缓慢。目前,包括总干事赵夏在内,整个组织也仅有3名专职干事。而从运作中来看,理事会事实上是虚设的,总干事赵夏几乎拥有一切事务的最终决定权。

可见,G市工友是一个结构简单、资源匮乏、地位不太明确的边缘草根组织。虽然G市工友是一个边缘草根组织,但自成立以来,G市工友还是开展了许多活动,并在G市范围乃至珠三角地区工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截至到2006年10月,G市工友的一些基本数据如下:

走访医院100余次,探望受伤工友5000余人,帮助工友进行工伤认定600余次。累计接待劳资纠纷的工友投诉200余宗,其中一些特殊法律援助案件被媒体报道,产生了一定社会效应,如某童工伤害案、某公司暴力讨薪案等。派发《劳工法律手册》和《工伤维权》传单各10000多份,举办“工友依法维权系列讲座”35次,累计参加人数近1000余人。调查了19家企业,获得近2000份调查问卷,撰写19份调查报告;寻找媒体合作,对严重违反劳动法规的企业进行了曝光。

总体来说,G市工友已经成为在珠三角地区致力于为工友服务的重要机构,并在工友中产生了较好影响。2007年,同类组织G市打工族因为种种原

因而无法再正常运作,G市工友显得更为一枝独秀。应该说,这种结果,与G市工友采取了相对适宜的行动策略有关。

3 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

行动策略本质上涉及到组织与其他相关组织的互动。G市工友行动所涉及到的组织主要有四类:与G市工友功能相似的同类组织,比如G市打工族;政府及有关部门,包括G市工友所在基层政府、劳动局等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和媒体;捐赠者。在以上四类组织中,由于捐赠者是草根组织最直接的资源供给者,因而也必定是草根组织最大的合作对象,因此本文并未将其列为边缘草根组织行动策略所指向的分析对象。那么,在面对政府、同类组织、研究机构与媒体这三类组织的时候,G市工友的策略将是什么?在对G市工友长期的观察研究中,我们形成了一些迥异于现有研究的基本观点:

(1)“合作”并非总是边缘草根组织与其它组织优先选择的行动策略;(2)面对不同类型的组织,边缘草根组织可能采取四种性质不一样的行动策略:拒绝(不愿合作)、避免(不敢合作)、默许(可以合作)、欢迎(积极合作)。在对G市工友的观察中,我们观察到了前面三种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第四种策略就无可能。(3)虽然现有组织理论对于组织间关系已经提出了很多解释框架,但对于边缘草根组织行动策略的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综合与探讨。

3.1 拒绝:与本地同类组织的“不愿合作”

G市打工族是与G市工友同样性质的组织,由于G市打工族成立更早,影响更大,加上赵夏曾经在G市打工族做过理事会成员,两家组织领导人彼此熟悉。因此从理论上来说,G市工友应该也可以与G市打工族合作,以扩大自身影响力,拓展生存空间。但是,在G市工友总干事赵夏看来,由于G市打工族成立较早,影响较大,它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G市上空,“旗大招风”,与G市打工族走得太近将可能置G市工友于“风口浪尖”;而G市工友力量还很薄弱,这种结果可能带来的后果对G市工友来讲可能是致命的。比如,如果G市打工族遇到了什么问题,则G市工友也不能“独善其身”。如果要扩大G市工友的影响力,通过“默默运作,默默的工伤探访和默默的法律援助”更为有效。

基于这些想法,G市工友并没有想与G市打工族合作,而且还对可能的合作机会给予了足够警惕。G市打工族曾经多次打电话给赵夏,希望他能够加入G市打工族,以便同时促进两个组织更好

地发展,但都被赵夏拒绝了。事实证明赵夏的担忧并非多余。目前,G市打工族由于内部人事矛盾、运作不规范(比如收取工友诉讼费用而陷入官司纠纷)等各种因素,已经陷入重重困境中不能再继续运作。

3.2 避免:与政府有关部门“不敢合作”

G市工友的主要职能是为工友提供服务,这让它与一些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关系微妙,比如劳动部门。劳动部门的职能之一就是代表劳动者(包括工友)的利益,并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可以说,无论在性质定位还是活动领域上,G市工友都与劳动部门有很多交集之处,也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事实上,自G市工友成立以来,到访最为频繁的确是G市劳动局。2007年3月,G市劳动局两位工作人员到访G市工友,要求G市工友出示相关执照或者资格证明,同时指出G市工友的《G市工友》《劳工法律手册》没有刊号和经过相关机构批准。劳动局的人还怀疑,G市工友“虽说规模小,但是每月租金,干事工资都要开销,如果不向工友收费,怎么才能维持?”

劳动局的频繁到访也引起了G市工友办公所在地基层政府的注意。此后,G市工友所在的H区派出所、居委会经常上门检查,他们提出的疑问是:

现在政府已经非常重视劳动纠纷问题,劳动监察支队都进驻社区了,居民、外来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们反映,为什么还要你们这些组织呢?

虽然赵夏以“G市工友提供的服务比较多样,而且形式灵活,是对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作为回应,但仍然无法说服居委会和派出所。此后居委会、派出所坚持以G市工友“没有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为由,要求房东不要再租房给G市工友。

按照赵夏最初的想法,G市工友非常希望能与劳动局、工会等部门合作开展有关工友维权的事情,也做出了一些尝试,但是经历这些检查以后,G市工友不敢再提合作了,转而变为希望G市工友能远离政府的视野,扎扎实实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于是,G市工友搬迁到了G市T区一个更为偏僻的地方。因为T区的地方比较偏僻,活动不太引人注目,G市劳动局上门次数大大减少。但遗憾的是,由于T区比较偏僻,工友对其举办的讲座等活动的参与率也大大下降。在赵夏看来,对于这些检查他们“惹不起,但躲得起”,虽然搬迁使其活动效率下降,但也是一个可以让组织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G市工友在行动上对政

府部门采取了消极的“躲”策略,但在组织发展方向上,G市工友与政府的大方针靠得更近了。在《G市工友》发刊词上,对于G市工友的工作任务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的工作就是响应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建设和谐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号召,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3.3 默许:与研究机构和媒体的“可以合作”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草根组织对于研究机构和媒体都表现出了非常谨慎甚至拒绝的态度,但G市工友却不同。

G市工友的成立本身就与研究机构的支持有关。2003年,赵夏在G市开了一个圣诞礼品加工厂,厂子规模虽小但效益不错。不过,由于在开工厂期间赵夏目睹了很多工厂主压榨工友来牟取暴利的内幕,于是在2004年将工厂关了。此后不久,赵夏在一次交流会上遇到了G市某高校的杨老师。由于两人以前都在同一个网络论坛上发表过评论,因此一见如故,并开始一起到工厂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宣传过程中,他们留下了杨老师的电话,以便工友咨询,后来就有工友开始给他们打电话反映问题,人数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开始商量筹建G市工友。由于具有这样一层关系,G市工友对研究机构一般都不会太抗拒,而是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可以合作”。

对于特定媒体,G市工友也表现出了同样“可以合作”的姿态。在赵夏看来,G市有些媒体是比较公正的,因此赵夏一般会允许他们报道G市工友,并因此而与其中一些记者变成了朋友。2006年《G市日报》和《G市市民》分别以《赵夏:致力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和《赵夏:从老板到工人维权活动家》为标题,报道了赵夏的事迹。G市工友有时候也会主动与记者合作,比如将他们在工厂调查的结果诉诸媒体。在赵夏看来,这种合作对于曝光非法损害劳工利益的工厂和维护工友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讨论:为什么不合作

上述可见,由于边缘草根组织的特殊地位,它们采取了诸多特殊策略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很显然,在G市工友面对其他组织选择行动策略

的时候,合作——至少是非常积极的、心甘情愿的合作——已经不是他们所选择的策略。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4.1 讨论的基础

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组织与其他组织间的互动吸引了组织理论家、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等诸多学者的目光,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在不同的研究层次上对组织间的互动给予了解释,并形成了许多理论学派,其中主要的有资源依赖学派、新制度主义、战略选择理论。

资源依赖学派将资源交换看作是组织间关系的核心纽带。普费和萨兰希克在1978年发表的经典作品《组织的外部控制》^[7]中,提出组织生存的关键是“获得并保住资源的能力”。为了生存,组织必须与那些控制资源的外部行动者进行互动交往。资源交换建立于组织的理性行动前提下,在交换过程中,组织会依据某些条件来选择连结对象^[8]。

新制度主义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更多的是组织的结构同形问题。前期的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结构并不是一个基于组织目标的主动设计的理性过程,而是组织在制度环境^①的压力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结果^[9,10]。后期的新制度理论开始关注组织在制度环境中积极主动的一面。奥利弗指出,在不同的条件下,面对制度环境的要求,组织会选择从默许、妥协、避免到抗拒、操纵等不同的应对战略^[11]。有学者也指出,随着组织地位的不同,它所选择的制度环境是不一样的。组织会根据自己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定位来选择各自合乎情理的行为方式^[12]。

蔡尔德是战略选择理论的代表学者,他的研究使组织行为学的研究重点从结构决定论重新回到了组织当权者(Dominant Coalition)^[13]。米尔斯和斯诺继承了蔡尔德的战略选择模型,并进一步将组织当权者对组织行动策略的作用进行了界定:决定组织对一些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物做出反应,负责审视环境并决定应该考虑哪些因素;他们进行的决策确定了战略、结构和业绩的界限范围^[14]。

显然,以上讨论都从不同角度解释了组织行动策略的选择。对于边缘草根组织行动策略的解释,我们必须从现有的解释中抽取最有解释力的概念,同时回到边缘草根组织生存的真实世界。

4.2 一个可能的解释框架

结合已有的讨论和田野观察,我们认为,有三个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

^①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为人们广为接受(Taken for Granted)的社会事实。”

(1) 依赖。依赖是合作伙伴提供重要资源的程度^[15]。资源包括有形的人力(领导者、专家、义工和顾客)、财务(硬件设施、财力)及无形的权力(知识技能、承诺、信息)等,单一组织不可能拥有各类型的资源,因此组织必须通过“交换”进行合作。依赖就是组织在资源有限,且内部难以自给自足时,必须与环境中控制关键资源或要素的他人或组织进行交换的一种关系。

基本上,依赖是相互的。当两个组织的依赖程度对称的时候,组织间的合作容易达成并且可能持久^[16];当两个组织依赖程度不对称的时候,合作可能不会达成或者遭到破坏^[17]。

(2) 信任。信任是组织对拟合作者的一种信赖,相信其表现有利于己,且不会产生不利的结果或行动^[18]。因此,信任是组织的一种意图,这一意图是导致组织进行后续互动的驱动力。

依赖体现的主要是组织的客观需求,而信任却代表着组织对拟合作者的主观判断。但与依赖类似,为了维持长久且稳定的合作关系,信任必须是相互的^[19],仅有单方面的信任,难以让双方的信任持续下去,唯有相互信任才可促使双方合作,进而达到长久的伙伴关系^[20]。

(3) 决策者。很多时候,依赖和信赖可能都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主观判断。对一个结构简单的边缘草根组织而言,这一判断就是组织核心决策者的判断。组织决策者的判断,可能立足于对现实的分析,但很多时候也可能仅仅是其直觉与个人偏好。因此,与依赖和信任相比,决策者是一个更随意的因素,但它可能对组织的行动策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为了更直观地分辨这三个元素影响下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可以将这三个因素放置在坐标图上(见图1)。横轴代表依赖,纵轴代表信任,而决策者,则代表着组织对依赖与信任状况的判定。根据依赖和信任的程度,边缘草根组织将显示出四种



图1 依赖-信任-决策者 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解释框架

行动策略,低依赖-低信任的“不愿合作”(对同类组织)、高依赖低信任的“不敢合作”(对政府部门)、低依赖、高信任的“可以合作”(对研究机构和媒体)、高依赖、高信任的“积极合作”(尚未发现)。

由于我们并没有在G市工友的个案中找到它“积极合作”的对象,因此下面的解释主要针对前三种策略。但显然,在合适的条件下,目前G市工友“不敢合作”的政府部门可能会转化为G市工友谋求“积极合作”的对象。

4.3 对G市工友行动策略的解释

在“依赖-信任-决策者”的框架下,G市工友行动策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释。

首先,G市工友的决策核心就是总干事赵夏。从G市工友的发展来看,赵夏基本上承担了组织宗旨确立、价值和目标设定、组织建设与管理、资源汲取以及公共关系等重要事务。G市工友的行动策略,在根本上打上了赵夏的烙印,体现了赵夏的个人风格。

赵夏,1960年出生于浙江,本科学历。赵夏很精明,曾经自己开过工厂,具有管理团队的能力;同时又有江南才子的涵养,无论是文艺创作、刊物编辑,还是演讲表达、网站维护,赵夏都能应付自如。最特别的是,赵夏还是一名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倡导者。赵夏的一位朋友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记录赵夏和他进行思想讨论时所持的观点:

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它是民主的社会形式。它并不反对私人拥有财产,并用这些财产谋取利润。它反对的只是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特权。它明确宣言:人类的发展在现阶段不能缺少资本和利润。社会主义追求劳动和资本的平等,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诸方面的平等,和为了实现上述平等而应有的分配的公正。社会主义允许资本享有权利,正如要求劳动享有权利一样,但是反对资本成为权力,也反对权力成为资本。

赵夏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同样可以在G市工友的宗旨中清晰可辨:

以“权力、责任、尊严”为基本价值观,以“自尊自信、互助关怀”为口号,坚持“使周围的每一个劳动者有权利、有责任、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的组织使命,力求促进现代企业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分配,即促进“一切所有制形式下企业的雇员或他们的代表与企业方平等谈判机制的建立”。G市工友服务只能关心维护劳工体面地参加劳动的权利、获得公平合理报酬的权利、休息的权利、获得安全劳动保障以及民主参与权利;并以“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共赢和整体繁荣”为宗旨。

根据我们与赵夏的多次接触,可以说这一看起来非常宏大的宗旨并不是流于形式的空洞口号,而是赵夏反复思考、不断探索后的思想体现。赵夏的这些认识是他成立G市工友的思想基础,也让他对工友维权有独特的看法,并因此而构成了G市工友行动策略的基础。

(1)同类组织:“低依赖-低信任”的“不愿合作”。在赵夏看来,同类组织G市打工族来与其在资源交换上的基础并不深厚,甚至可以说,由于二者服务对象的一致,在劝募资源的时候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竞争。同时,G市打工族成名比较早,因为内部管理的问题还惹上了一身官司,因此,赵夏虽然曾在G市打工族工作过,但对该组织一直不太信任。

而且,与G市打工族不同的是,赵夏对G市工友的发展方向想得更为深远。由于赵夏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对工友提供援助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倾向于给工友“充权”(Empower),让他们以平等姿态与资方谈判。赵夏认为,对工友的帮助不是仅限于帮他们做代理,帮他们成功获得应得的工伤赔款,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自己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在调查中看到,赵夏经常花很多时间不厌其烦地给G市工友的干事、志愿者和来访的工友讲解公平、稳定、和谐的真正涵义。赵夏的这种努力,一方面深化了其他人对组织宗旨的理解,另一方面也确立了G市工友区别于G市打工族的独特之处。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G市打工族对G市工友而言便成了“低依赖-低信任”的组织而不可能有合作的机会。

(2)政府部门:“高依赖-低信任”的“不敢合作”。由于G市工友既无合法性,又缺乏足够的资源,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劳动局应该是G市工友选择的合作伙伴。事实上,在最初的时候赵夏也有类似的想法,而且做过尝试。不过,劳动局几次抱着怀疑的拜访大大降低了赵夏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因此,虽然与劳动部门的合作将大大拓展G市工友的生存空间,但赵夏也将之归结为“高依赖-低信任”的组织而不再奢谈合作,而是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

不过,虽然G市工友对政府部门采取了“不敢

合作”的态度,但它会尽量将自己的工作与现有的正式话语体系相接轨。“政府对NGO的态度如何直接影响着其运作的效果。即使政府不压制它们,它们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也会使其丧失利用政府网络进行运作的机会,同时其他的社会组织也会对其敬而远之。”^①G市工友这样做,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怀疑和不理解。

(3)研究机构和媒体:“低依赖-高信任”的“可以合作”。虽然适度的研究机构支持与媒体报道,对于G市工友赢得舆论和社会的支持比较重要,但是研究机构和媒体一般不能直接给草根组织提供资源,因此这类组织对于G市工友来说,基本上属于“低依赖”的组织。不过,基于G市工友与许多研究机构和媒体的朋友关系,G市工友对于这类组织也表示了“可以合作”的姿态。

从G市工友成立之初,赵夏就与高校等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以这些研究机构为中介,G市工友创建了自己的社会网络。由于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推崇,赵夏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网络中,都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批朋友中有部分来自研究机构,也有部分来自媒体。这些朋友对G市工友可能不会提供直接的资助,但与研究机构的交流扩大了G市工友的对外交流,也开拓了其志愿者资源;而与媒体的接触,则为G市工友提供了道义上的援助和舆论支持,媒体报道的示范效应还吸引了很多工友来寻求帮助。

5 结论

在当前中国,尚在水面之下的还有大量边缘草根组织。这类组织即便处于边缘状态,但其具备的一些优势仍然能使之生存并履行其使命。这些优势至少包括:第一,贴近底层。边缘草根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要求其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基层,理解服务群体需求。另一方面,这类组织的部分工作人员来自于基层,对其服务群体的状况十分了解^①。第二,及时回应。边缘草根组织的优势在于可以迅速辨认服务群体需求并给以积极回应^②。借助这些优势,同时利用行政体系中条块分割的特点和职能真空地带,边缘草根组织找到了其生存空间。

但是,这类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尴尬是:组织影响力太小对其发展是一种阻碍,但组织影响力太大所带来的过多关注也将可能危及其生存。在这种双重胁迫下,边缘草根组织只能采取特殊的行动策略。现有研究将合作视为草根组织理所当然的

^①比如G市工友的干事,本身就是工友或者深入接触过工友,感同身受,他们的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针对性。

^②赵夏在访谈中说:“我觉得我们是问题导向的,看来求助的工人是什么问题多,我们就开展相应的服务。”

最佳行动策略,或者认为它们会积极寻求被国家行政体系吸纳^[21]。可是,当我们进入草根组织的真实世界却发现:草根组织会因为对其他组织的依赖、信任程度不同以及自身决策者因素而选择不同的策略,比如拒绝(不愿合作)、避免(不敢合作)、默许(可以合作)、欢迎(积极合作)等。赵秀梅的研究已经观察到草根组织会“有意识限制组织规模”来进行自我克制^[2];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与政府相关部门)不合作可能是边缘草根组织经常选择的策略。这一策略至少可以保证边缘草根组织在夹缝中生存且不断延续其使命。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合作并非边缘草根组织的主动不合作,而是被迫的不合作。因此一个更深层的障碍在于,不合作也会导致这些组织总是处于边缘状态而无法实质性壮大。如果提升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我们对边缘草根组织这一困境将有更深刻的认识。虽然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已经被多次批判,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便利的分析工具。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合作主义来概括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比如徐勇的“竞争-合作主义”^[22]、杨光飞的“地方合作主义”^[23]、何艳玲的“权变的合作主义”^[24]等等。虽然合作主义在他们的研究中各有所指,但其基本意思都是指国家与社会基于资源交换基础上的共识和共同行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这种资源交换没有以制度化分权为保证,则“合作”必定会是偶然的、非常态的;更进一步,“不合作”却可能成为常态。在此情境下,国家-社会之间互动的成本将变得非常高昂。而这一点,对于可能约束国家、市场力量的“社会”成长必定是有害的。

参考文献:

- [1] 朱建刚. 草根 NGO 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J]. 开放时代, 2004(6): 36-47.
- [2] 赵秀梅. NGO 在中国——中国 NGO 对政府的策略: 一个初步考察[J]. 开放时代, 2004(6): 5-23.
- [3] 辛甜. 社会网络与慈善筹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个案研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4): 2-66.
- [4] 张紧跟, 庄文嘉. 非正式政治: 一个草根 NGO 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08(2): 133-150.
- [5] 郑功成, 黄黎若莲. 中国农民工问题: 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6): 2-13.
- [6] 程刚, 何磊, 董伟. 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机器吃人何时了? [EB/OL]. (2005-01-02)[200801-02]. <http://en.chinagate.com.cn/chinese/news/33660.htm>
- [7] PFEFFER J, SALANCIK R.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 [8] 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9] MEYER W, BRIAN R.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3(2): 340-363.
- [10]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1] OLIVER C.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1): 145-179.
- [12] HAN S K. Mimetic Isomorphism and Its Effect on the Audit Service Market [J]. Social Forces, 1994, 73(2): 637-663.
- [13] CHILD J.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Strategic Choice [J]. Sociology, 1972, 6(1): 1-22.
- [14] MILES E, SNOW C.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 [15] BUCHANAN L. Vertical Trade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Dependence and Symmetry in Attaining Organization Goal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2, 29(1): 65-75.
- [16] GANESAN S. Determinants of Long-Term Orientation in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4, 58(2): 1-19.
- [17] LUSCH C, BROWN R. Interdependency, Contracting, and Relational Behavior in Marketing Channel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 60(4): 19-38.
- [18] ANDERSON C, NARUS A. A Model of Distributor Firm and Manufacturer Firm Working Partnership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 54(1): 42-58.
- [19] ANDERSON E, WEITZ B. Determinants of Continuity in Conventional Industrial Channel Dyads [J]. Marketing Science, 1989, 8(4): 310-323.
- [20] SMITH B, BARCLAY W.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Differences and Trus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elling Partner 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7, 61(1): 3-21.
- [21] FOSTER K W. Embedded Within State Agency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Yantai [J]. The China Journal, 1992, 47(1): 41-65.
- [22] 徐勇. 治理转型与竞争-合作主义[J]. 开放时代, 2001(7): 25-33.
- [23] 杨光飞. 地方合作主义中的权力越位[J/EB].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4-06-30)[2008-01-30].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404024g.htm>.
- [24] 何艳玲. 都市街区中的国家与社会: 乐街调查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arrangements.

Key words : Open Policy ; Financial Crisis ; Economic Initiative ; Strategic Arrangement

(5) Government Reputation , Government Ability and NGOs' Trust in Government

Xu Guihong ·40·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 He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Zhengzhou , 450011 , China)

Abstract ID : 1672-6162(2009)01-0040-EA

Abstract : For a long time , only government's trust in NGOs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and NGO's trust in government has been neglected instead. In fact , the latter is also very important , on which government reputation and government ability are very influential.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emphasize on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reputation and government ability on trusting in government as well , only limited in the field of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reveal how government reputation and government ability affect trust in government , the author takes project managers in NGOs and volunteers as sampling uni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GOs and government sectors as background.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reputation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 and between government ability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are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reputation , government ability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What's more , government ability has greater positive effect on trusting in government than government reputation. So , in order to obtain trust and support from NGOs , it is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for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good reputation and cultivate higher capacity. Certainly , there are some other factors such as NGOs' organizational and systematical characteristics , which also affect NGOs' trust in government sectors and the research model can be developed further to analyze NGOs' trust in government more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 Government Reputation ; Government Ability ; NGO ; Trust

(6) The Possibility of Non-Cooperation :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Grass Roots Organizations'

Acting Strategy

He Yanling¹ , Zhou Xiaofeng² , Zhang Pengju¹ ·48·

(1.School of Government , Sun Yat-sen University , Guangzhou , 510275 , China

2.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119620 , Singapore)

Abstract ID : 1672-6162(2009)01-0048-EA

Abstract : Most researches on Chinese Grass Roots Organizations (GROs) regard that "cooperation" is the best action strategy of GROs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GRO , the paper finds that : firstly , "cooperation" is not always the preferred action strategy of GRO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 secondly , facing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 GROs may adopt four kinds of strategies : refusal (unwilling to cooperate) , avoidance (dare not cooperate) , acquiescence (can

cooperate) and welcome (actively cooperat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dependence-trust-decision-maker" to explain the action strategy of GROs.

Key words : Non-Cooperation ; Marginal Grass Roots Organizations ; Action Strategy

(7) Analysis on Regional Disparity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s in China

Ke Huibing · 55 ·

(Institute of Social Security Stud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D : 1672-6162(2009)01-0055-EA

Abstract : As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also reflects a clear characteristic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which make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not play its supposed function of re-allocation to reduce regional im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lated indicator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in reg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issue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s in Tax System Distribution Reform during last decade, includ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financial burden,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per capita,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and the local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abilities, and then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s. Finally,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ut forward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transfer payments.

Key words :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 Regional Disparity ; Transfer Payments

(8)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Pension 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ypical OECD Countries

Zhu Yanxia^{1,2}, *Huang Bin*³ · 64 ·

(1. 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

2. School of E&M,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

3.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Group) of China,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D : 1672-6162(2009)01-0064-EA

Abstract : In order to dissect the conditions and deep reasons of pension system reform and understa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reform, the paper prob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nsion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the 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structure.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overall structure of pension system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private pension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tests concerning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scale of